



中国人口素质（生活质量） 问题科学研讨会会议综述

由国家教委PO4项目会同国家计生委、中国人口学会联合召开的《中国人口素质（生活质量问题）科学研讨会于1991年12月20日至24日在北京举行。国家计生委吴景春、杨魁孚副主任，科技司朱跃华司长，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邬论萍、田雪源教授，PO4项目阚延河主任，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司孙怀阳司长，社会统计司熊振南副司长，民政部婚姻管理司王德意司长，北京经济学院副院长臧吉昌副教授应邀出席了开幕式并讲了话。会议由课题负责人之一冯立天教授主持。

应邀参加研讨会的专家学者共计44人，提交论文40篇。代表们来自高等学校、科学院系统、有关业务部门和学术团体。出席的代表中不仅有老一辈学有成就的名家，还有一大批崭露头角的年轻新秀。

与会代表一致指出，召开这次研讨会是适时的，是经我国社会实践提出的必须进行强化研究的现实课题。

（一）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和改善人口生活质量，是我国既定的人口发展战略。人口素质和生活质量既是人口发展的重要内容，又是人口发展的归宿。自七十年代初我国全面开展计划生育工作以来，人口控制取得了瞩目的成就。虽然，我国正处于第三次出生浪潮的顶峰，人口增长形势相当严峻，无疑要对计划生育工作继续给予加倍关注，但提高人口素质和生活质量问题已提到政府决策当局的议事日程上来了。实践证明，控制人口数量的成果能否巩固并取得新的突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国人口素质和生活质量的提高状况以及采取何种发展战

略。

（二）中国到2000年的发展目标，是要使中国人口达到小康水平，而达到小康水平的经济能力界定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800—1000美元。这就要求决策部门和有关学者去研究小康水平的人口素质和生活质量问题，并予以量的描述。这里有很多问题其中包括方法论问题需要探讨研究。

（三）迄今为止，我国人口学界、国家有关部委召开过不少全国性的人口专题科学讨论会，但以人口素质为主题的只召开过两次，重点研究生活质量则尚付阙如。说明过去研究攻关的侧重点是人口的数量方面，素质、生活质量的研究特别是综合性的研究不仅为数不多，且在理论上、方法论上有待开发。

（四）在反映人口素质、生活质量或社会发展程度方面，七十年代以来国外已流行一些综合指数计量方法，如美国健康协会指数（ASHA），莫里斯的物质生活质量指数（Physical Quality of Life Index，简称PQLI），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0年又推出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简称HDI）等。他们用这些指数进行国别计量和比较研究，借以说明各国人口素质、生活质量或社会发展程度的差别与顺位。这也要求中国学者对上述综合指数进行客观的评估，并创造出适合中国国情和进行国际比较的更为完善的综合指数。会议就以下问题进行了重点探讨：

1. 关于有关概念、范畴问题

由于这次研讨会的名称在人口素质后面加了一个括号“生活质量”，而且在探讨国

际上流行的综合指数时，又涉及社会发展指数、人类发展指数等概念，因而有必要作一些澄清，把握不同概念、范畴的内涵与外延，以利于研究。

与会代表认为，人口素质与人口质量是同一个概念，不能仅从遗传学角度去理解，而且主要不应从遗传学角度去理解，否则会导致某一物种优越于另一物种的反科学结论。基于这种认识，人口素质或人口质量的概念是能够接受的。西方多数学者讳忌人口素质或人口质量一词(Population Quality)，主要是避种族优越论或种族劣质论之嫌，因为他们是从遗传学角度来理解这一概念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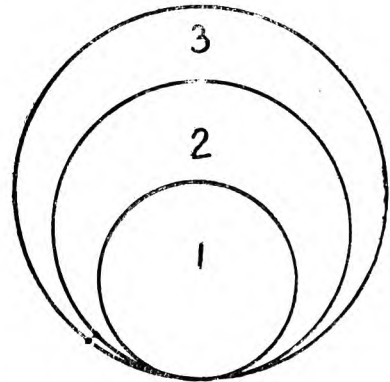
但是，人口素质的内涵是什么？与会代表存在两种不同的认识。一是三要素论，认为人口素质应包含身体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但对思想道德素质又可区分出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是指特定社会经济形态下所特有的思想道德观，如社会主义制度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道德意识形态、集体主义的世界观等；另一种则认为是超越特定社会经济形态或超越若干特定社会经济形态的泛人类所必需遵循的道德行为规范。二是二要素论，即人口素质只能由身体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构成。如果把思想道德素质包括进去，由于缺乏统一的衡量尺度，难以进行人口素质的国际比较。即便是泛人类所必须遵循的道德规范，进行指标分类和量化也是很难解决的问题。

生活质量是一个人们可以领悟但又难下精确定义的范畴。有人认为生活质量是指人们生活状况的丰裕程度，包括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和存活的健康状况。有人指出生活质量是生活条件的综合反映，而生活条件则包括生活环境、教育、供给、卫生保健、社会服务、文化娱乐、社会风尚、社会治安、社会福利等诸多方面。不管人们如何理解生活质量，作为人口生活质量的范畴，尽管研究角度不同，研究的出发点不同，但就其内涵

来讲，人口素质包容在人口生活质量的范畴中，这点是无疑的。

近年来，社会发展是一个比较时髦的概念。社会发展概念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前者包括经济发展，后者则将其排除在外。社会发展是指一国或某一地域人类社会总体活动合乎规律的进展程度。因而，用以衡量一国或地域社会发展程度的指标大类及子类，远较生活质量指标丰富。自1990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表《人类发展报告》和创立人类发展指数以后，又增加了人类发展（有些学者译为人文发展，英文为Human Development）的新概念。与会代表认为，所谓人类发展，就是指人类社会的发展，因而人类发展与社会属同一个范畴。

如果将上述范畴就其内涵加以理解，则可画出直径不同的三个圆圈，其间的包容关系如下面所示：



1. 人口素质或人口质量
2. 人口生活质量
3. 社会发展或人类发展

2. 关于反映人口素质生活质量或人类发展综合指数的方法论

不少与会代表就国际上较为流行的物质生活质量指数(PQLI)和人类发展指数(HDI)进行了分析与评估。PQLI指数系由大卫·莫里斯等人于1977年提出来的，旨在衡量穷国生活质量的状况。该指数由识字率、婴儿死亡率及一岁预期寿命三个指标通

过指数计算综合出来的，方法简便易行，三项指标反映了穷国人们的普遍愿望，直接体现生活质量本身即成果。通过与投入指标比较，可以帮助决策者调整所选择的发展战略。

与会者认为，PQLI指数也有其局限性。首先，在三个构成指标中，反映健康状况的就有两个指标，实际上是赋予健康指标以双倍的权重，这在方法论上难以自圆其说；其次，它不适于衡量富国的生活质量，对穷国来说，仅以识字率来反映基本文化需求，也同当今时代相去甚远；最后，PQLI指数过份简单，在其构成指标中应当包括物质生活指标。与会者在指出其局限性的同时，纷纷提出一些经过深思熟虑的改进意见。如有的学者提出可将婴儿死亡率和一岁预期寿命两个指标，用0岁预期寿命指标代替；识字率可用2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年限）代替或补充，或采用各级学校入学年龄在校率指标等综合出文化教育指数，还有学者提出应增加25岁以上人口受过中等教育以上人口所占比重指标参与文化教育指数的计量等等。

1990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首次推出人类发展指数，简称HDI。该指数由平均预期寿命、成人识字率和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三个构成指标分别换算成指数，然后再计算其平均值而得出的。HDI指数在方法论上吸收了PQLI指数关于最大值与最小值的合理内核并有所发展与创造，同时把人均GDP纳入构成指标体系中，是优越于PQLI指数的生活质量或人类发展的测度方法。但与会代表指出，HDI指数也有值得探讨的地方。首先，用发达国家贫困线水平的人均收入作为人均GDP的最大值，缺乏理论根据和说服力；其次，人均收入和人均GDP是两个不同的经济指标，两者加以比较在方法论上违反对比一元性原则；第三，显著缩小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实际存在

的差距；第四，人均GDP对生活质量 and 人类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只要对GDP本身给予科学的测定和进行不平等分配的调整，是应当按比例增加的，不会出现对数规律急剧递减态势。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1年发表的HDI指数，在方法论上做了不少补充与修正。例如反映知识变量的指标由原来的识字率一个指标，增加为两个指标，即识字率和平均受教育年限；承认高于发达国家贫困线水平的收入对生活质量和社会发展仍有一定的贡献，等等。与会代表肯定上述修正是朝正确方向前进了一大步，但仍有值得商讨的地方。首先，对知识变量两个构成指标赋予不同的权重，缺乏令人信服的论据；其次，新HDI仍坚持随收入提高对人类发展贡献依次加速度递减的观点也缺乏理论根据。有些与会代表在论文中倾向于不承认收入贡献递减规律的存在，并据此进行了计算比较，得出的结论是令人信服的。例如按1991年人类发展报告收入递减公式计算，中国和日本的人HDI值比为1:1.62；如无贡献递减，其比值为1:1.78；可见，在无递减条件下，中日两国HDI指数值的距离拉大了。

此外，有的代表利用模糊隶属函数建立人口素质三要素综合指数模型，在方法论上是一种创新的尝试。还有的代表选定了九个指标（平均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残疾人口比重、总和生育率、男性成人识字率、女性成人识字率、受过高等教育人数占总人口比重、城市人口比重、15—64岁人口所占比重），借助系统聚类分析方法，组成评价指标取值阵，最后计算人口素质综合指数，对我国28个省区、直辖市进行计算，并与PQLI值比较，所得结果是令人满意的。

3.关于人口素质的木桶理论

有的代表将人口素质划分为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两大方面，后者又由智力素质和非智力素质组成。人口素质如同一个木桶，身

体、智力、非智力就像构成木桶圆周的木板，中国人口身体素质的木板最宽最高，智力素质次之，最窄最低属非智力素质。因而中国人口素质的主要问题在于非智力素质，而非智力投资又是投入少、产出多、见效快的高效投资。无疑木桶理论要求决策层花大气力解决非智力素质问题，是当务之急。有代表还用中国PQLI值居中等水平，而人均GDP居中下等水平的数据，说明中国的身体素质素质和智力素质已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对这一“超前”，与会代表存在着截然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超前反映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另一种观点则相反，认为它恰恰说明了非智力因素存在巨大障碍，阻挠人口整体素质水平的提高，从而形成实际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于PQLI值所对应的程度。有的代表则根本不同意存在着所谓超前的现实，一则计量人均GDP采用官方汇率办法欠科学，成若干倍地低于按国际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二则中国的身体素质智力素质在大力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大环境下，仍显著落后于现实生产力的客观要求，更不用说什么“超前”了。

4. 人口素质的逆淘汰问题

有的代表在论文中呼吁社会各界和决策部门应当关注我国人口素质的逆淘汰问题。人口素质逆淘汰，分总体人口素质逆淘汰和身体遗传素质逆淘汰两种。前者指由于自身素质的差异和外界环境的不同所引起的生育率差异对人口健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后者指由遗传基因差异引起的逆淘汰，越是有遗传生理缺陷的父母，越有条件为社会生育更多的孩子，而身体健全的父母其生育则加以严格的限制。人口控制缩小了总体人口素质的逆淘汰，而遗传基因的逆淘汰则与人口控制有关。要克服这种逆淘汰，唯有使计划生育工作臻致完善。

另有代表则持不同的看法，认为从局部上看的确实存在逆淘汰，但这种现象不足以影

响全局，无需将逆淘汰问题提到民族前途的高度加以讨论。有代表回顾了高尔顿的工作，他曾不遗余力揭露与抨击各种具有“不利选择作用”（即逆淘汰）的社会机制，但他的努力是失败的，连他自己也感到困惑不解：“真正奇怪的是，欧洲血管里竟然还能保留足够的好东西，使其种族上升到目前的水平。”

5. 关于小康水平的生活质量

有的代表探讨了我国2000年达到小康水平时的人口素质和生活质量问题。这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研究起步较早。他们将人口素质筛选出11个指标，生活质量13个指标，将全国30个省区和直辖市划分为三个类别，京津沪为一类地区，辽、吉、黑、粤、苏、浙、闽为二类地区，其他20个省区为三类地区。不同类别地区分别规定2000年达到的不同目标，然后对各指标规定不同的权数，计算指标值或进行综合评分。这里有若干问题需要认真研究：一是人口素质和生活质量指标如何筛选，二是采用什么方法确定权数，三是如何规定小康水平的不同类别地区的指标目标，是否存在一个不论何种地区都必需达到的最低限度的指标目标。这些问题还有待更多的研究机构，有关部门和学者通力合作，共同攻关。

与会代表还就我国人口文化教育素质、健康素质进行了专题探讨，并对教育、健康的综合指数方法和投资向何方倾斜进行了研究；对城乡近年来出现的畸形消费与生活质量问题表示担忧，建议给予有效的政策和法规上的疏导。

本次研讨会会期虽短，但开得既紧张认真，又生动活泼。大会还专门就有关我国人口素质、生活质量的现实问题应向有关国家决策部门提出什么有参考价值的咨询意见，进行了交流。

（《中国人口生活质量比较研究》课题组）